

DOI:10.12361/2661-3263-05-11-120746

数字普惠金融与返贫阻断

——基于 2016 年 cfps 数据

贺慧文

华东政法大学, 中国·上海 松江 201620

【摘要】本文基于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 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返贫阻断影响, 结果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对多维贫困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即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返贫有显著的阻断作用。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返贫阻断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Poverty Reduction Blocking Based on 2016 CFPS Data

Huiwen 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ongjiang,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16 China Household Tracking Survey (CFPS) and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data from Peking University's Digital Finance Research Centr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poverty return deterrence,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deterrent effect on rural households returning to poverty.

[Key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eturn to poverty interdiction

引言

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 在这场战役中, 中国取得了全面胜利, 但是扶贫工作并没有画上句号。新时代, 扶贫工作有了新重点新取向, 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 同时防治返贫, 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

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它的爆炸式发展带动了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极大弥补了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利性的缺陷。融蓬勃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极大弥补了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利性的缺陷。

数字普惠金融对返贫阻断的影响研究, 相关的理论解释尚未得到系统性的实证检验。国内的一些学者发表了关于返贫阻断的预警机制研究以及基于居民的生活日常消费指标——例如电费、水费以及使用天然气煤气的费用——来研究防治返贫的效果。

1 文献综述

G20 杭州峰会上, 白皮书 GPFE 第一次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理念, 数字普惠金融是一种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让原本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人群, 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获取服务。

贫困是全球的一个普遍问题, 政府也在努力减贫。贫困不仅是低收入和低消费现象, 而且还包括健康、卫生、教育、政治地位和社会保障等其它领域所面临的劣势, 而贫困群体则缺少尊严、自尊和力量。(程漱兰、陈焱, 2001)。万广华等 (2014) 的研究表明, 资产的增加可以明显地减缓贫困的脆弱性, 所以应该通过增加穷人的财产, 并提升他们对资产的使用效率来减贫和减缓贫困的脆弱性。如果将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纳入到个人的资产范畴, 能够产生显著的福利效应 (刘振杰等, 2015)。但是, 对于刚脱离贫困标准线的家庭来说, 任何不稳定的外来不利因素都能够使其重新返贫, 这是由于贫困的脆弱性决定的, 因此, 对于刚脱贫的家庭来讲, 其生活水平仍然在贫困线浮动。如果仅在短期内通过发放低保实现减贫效应, 从长远来看, 无法实现减少贫困的脆弱性的目标 (徐超、李林木, 2017)。同时, 产业扶贫的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因为, 一方面, 产业扶贫可以大大减缓贫困的脆弱性; 另一方面, 产业扶贫在减贫工作、创业扶贫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其本

身就具备了金融的特点,它能够降低服务成本,拓宽服务边界,提高服务质量,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依托传统金融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如何反应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问题是研究者遇到的普遍障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有效的解决了这一难题,成为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依据。如易行健(2018)指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使居民消费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消费结构得到优化;周利(2020)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劳动力追踪调查(CLDS)的数据进行比对,结果显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对于已经实现脱贫的家庭或者个人来说,返贫的主要风险第一个在于身体健康出现了重大问题,并且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因病返贫;第二个是因学返贫。受教育水平不高,随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如果家庭成员中有正在进行高中、大学及以上教育经历的,高额的教育成本使那些脱离了贫困的家庭很容易回到贫困。返贫的区域性、突发性和频繁性决定了返贫的内在脆弱性。

普惠金融的宗旨是让所有人享有同等的金融服务,而数字普惠金融则是通过数字技术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金融发展的红利,使中低收入、小型企业能够享受到更好的金融服务。普惠发展的理念是与“共同富裕”同步发展的,它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相对贫困。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质量。传统金融的服务成本较高,而且更偏爱高净值的客户群,因此往往忽略处于正态分布尾部的农村居民、小微企业、私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在技术上的优越性使得其能够消解物理距离对传统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和金融可及度的制约作用。贫困人口因处于收入阶层的底层,因此对金融服务价格的敏感度较高,而数字技术的运用在金融服务领域中具有低成本的优势,这种优势能够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的服务品质并降低服务价格,因此更多的农村和贫困居民可以获得金融服务。获得金融支持对于贫困居民而言,有助于其做出更为长远的消费和投资决策,进而以较为恰当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并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收入增长,并缓解贫困状况。穷人无法脱贫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创业的原始资本,也缺乏创业的能力,同时由于传统金融嫌贫爱富的特征,贫困居民很难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也导致贫困家庭大多以慈善救济为生。通过为穷人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帮助他们创业,鼓励他们继续学习,以获得获得收入的技能和资本,数字普惠金融真正将“输血”变成了“造血”,帮助穷人走出贫困的陷阱。此外,数

字普惠金融还可以促进小微企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为农村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支持农村产品开发、农村商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教育,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改善了贫困状态。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数字普惠金融对返贫阻断有正向促进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计量模型

$$y_i = \beta_0 + \beta_1 DIF_i + \beta_2 X_{control} + \sigma_{it} \quad (1)$$

其中, y_{it} 代表农村家庭*i*的贫困指标,包括农村家庭*i*的收入贫困指数,多维贫困指数以及不同贫困标准下的贫困状态。解释变量 $DIFI_i$ 代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X_{control}$ 为控制变量,控制了可能影响贫困的状态的相关因素,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个人特征层面包括户主婚姻状态;家庭层面主要是家庭成员的构成,家庭规模;社会网络层面是指在通讯网络费用。 β_0 表示截距项, σ_{it} 是未观测随机误差项。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收入和多维贫困指数)

就目前来说,收入依然是确定贫穷的基本标准。在收入贫困问题上,本文采用了全国贫困线的相关定义,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2010年不变价格(2300元)为基准,这一贫困线标准在2016年调整为人均3146元,2018年又调整为人均3535元。

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识别脱贫人群的返贫的可能性指标不能仅仅使用收入,因此,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贫穷的视野转向了多维度的贫穷。多维度的贫穷可以更精确地反映出贫穷的实质(谢家智,车四平,2017)。多维度贫穷指数,又称为A-F贫穷指数,是由阿尔基尔和福斯特(2011)提出,MPI可以从不同维度上体现出个人或家庭层次上的贫穷差距和程度(张全红等,2011;左停,2017)。关于多维贫穷问题,参照杨艳琳、付晨玉(2019)建立的多维贫穷维度与指标,并将其与之相结合最后,本文从教育水平、健康水平、收入水平四个方面对CFPS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使用阿尔基雷-福斯特建立了衡量多维度贫穷的模型与方法,在剥夺阈值上,采用了更加严格的剥夺指数,并用等权法确定了其权重。第二个临界值参照沈扬扬等(2018)选取 $k=1/3$,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被剥夺指数与加权后的总分数大于 $1/3$,就被认为是多维度的贫穷(multipov)。

表1 多维贫困的维度、指标、剥夺临界值和权重

维度	指标	剥夺临界值与赋值	权重
教育	受教育程度	家庭成员有文化程度小于初中, 视为教育贫困, 赋值1	1/4
健康	自评健康	自评为不健康, 视为健康贫困, 赋值1	1/8
	医疗保险	有家庭成员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赋值为1	1/8
收入	收入 fincome_per	人均年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2300, 视为收入贫困, 赋值1	1/4
生活水平	饮水来源fa3	家庭饮用水为大自然水源(池塘水, 井水等), 赋值为1	1/8
	生活燃料fa4	做饭燃料以柴草等非清洁能源为主的, 赋值为1	1/8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参考范从来、谢超峰(2017)等人的做法, 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于2019年推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为依据, 该数据全面、准确地描述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各个层面, 并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所、蚂蚁金服等机构共同编写, 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和代表性。该指标涵盖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标、数字金融覆盖范围、数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VARIABLES	MPI	MPI
DIFI	-0.002***	-0.003***
	(-25.63)	(-24.20)
cont1_gender		-0.012***
		(-2.95)
cont2_marr		-0.035***
		(-6.00)
cont3_fu201		0
		-0.1
cont4_trco		0.003
		-0.55
fml2016_count		0.009***
		-7.87
Constant	0.740***	0.728***
	-38.46	-33.38
Observations	11,419	11,419
R-squared	0.043	0.054

字金融应用的深度、普惠金融的数字化水平; 另外, 在深度指标中还包括了支付, 信贷, 保险, 信贷, 投资和货币基金

3.2.3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6年的资料, 将个人资料与家庭资料进行比对, 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进行比对。其中, 收入贫穷指数是由人均纯收入的逆指标来表达的。采用收入与多维贫困指标以及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进行了分析。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见表2)

表2揭示来数字普惠金融与返贫阻断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验证了假说1。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 即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有显著的返贫阻断效果。

4.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该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本论文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李哈冰等(2021)的做法, 采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逆指标化来表示收入贫困指标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数字普惠金融的显著性并没有发生变化。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 进一步证实了回归模型是稳健的。

5 结论与启示

第一, 加强数字工具的推广, 健全数字基础设施, 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提高各类人群尤其是低收入人群优质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数字技术尤其是金融科技的发展, 因此, 对低收入者进行普及化的数字工具教育, 以及在外部环境中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 将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前, 数字普惠金融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一方面可以弥补传统金融覆盖面较少的不足, 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不同层次的人们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 有效的防止了贫困的脆弱性。

参考文献:

- [1] 邹薇, 方迎风. 中国农村区域性贫困陷阱研究——基于“群体效应”的视角[J]. 经济学动态, 2012, (6).
- [2] 徐超, 李林木. 城乡低保是否有助于未来减贫——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实证分析[J]. 财贸经济, 2017, (5).
- [3] 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 经济研究, 2019, 54(08): 71-86.